

澳華新文苑

第1228期(B)

戈壁荒漠上悲憤的呼喊

——讀趙旭《反右運動夾邊溝慘案倖存者證言》

二、為“中國大饑荒”立起沉重的墓碑： 《證言》和《墓碑》相得益彰

（接上期）由於趙旭以及和他一類具有正義感的知識份子對歷史真相不懈追查的努力，夾邊溝註定成了毛澤東執政罪惡史中一個逃脫不掉的名字。

夾邊溝農場在甘肅省河西走廊重鎮酒泉三十裡外，地處祁連山下，戈壁荒漠之中。1957年下半年反右運動高潮時，夾邊溝農場改為“勞教”農場，開始收容大多來自甘肅各地機關、企業、學校，甚至工廠、部隊揪出來的“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反右運動中工人和部隊戰士因領導不滿被打成所謂壞分子）和“地方主義反黨分子”等。夾邊溝常年風沙瀰漫，有限的農田嚴重鹽鹼化，主要植物為生長在戈壁沙漠的駱駝草，一年四季幾乎無降水，這些生態記錄一目了然。事實上，夾邊溝農場自開辦時起就只能接收四五百名勞改人員，因為它在國家供應糧油的情況下也只能養活這麼多人。但由於“反右”讓受害知識份子突然暴增，當局便將多達三千五百人源源不斷地押送至此，完全不考慮以後將會出現什麼樣的結局。這樣，三年半中，前一年半是這些知識菁英們的勞累史，後兩年也就是1959年初到1960年9月，則是他們的饑餓史。此後，在“大躍進”狂熱的背景中，當局又將已經餓得行走都困難的兩千多勞教人員，拉到了既無住處又無糧食的高臺驛明水灘山水溝去“改天換地”，結果他們在饑寒交迫的險境中幾乎全部凍餓而死！這個夾邊溝近三千人成了餓殍的慘案，趙旭採訪的倖存者留下了血淚斑斑的證言！

是什麼造成這種人間慘劇？以世界為家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馬迪亞·森曾經說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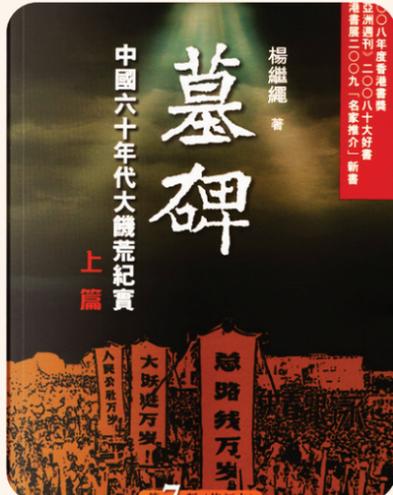
明水灘山水溝東溝右派們住過的洞穴（趙旭攝）



明水灘亂墳崗殘留的屍骨（趙旭攝）

“人类的饥荒史的一个重要的事实是，没有一次大饥荒发生在有民主的政府和出版自由的国家。饥荒发生在古代的王國，发生在当代的专制社会，发生在原始部落，发生在现代技术官僚独裁的国家，发生在帝国主义统治的殖民地经济，发生在一党专制的新兴独裁国家。但是，那些独立的、实行定期选举的、有反对党发出批评声音的、允许报纸自由报导的、能够对政府决策正确性提出质疑的、没有实行书报检查的国家，从来没有一个发生过饥荒。”

非常不幸，中國正是這麼一個一黨專制的獨裁國家。



楊繼繩長篇調查報告《墓碑》

就全中國來說，夾邊溝不過是一個小小點。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初三三年大饑荒中，這個國家究竟餓死了多少人，至今已有多部專著探討論述。據原新華社高級記者楊繼繩於2008年5月在香港出版的《墓碑》所述，全國死亡人數應不低於三千六百萬人。這部約一百萬字的長篇調查報告，參照了各種資料，詳細記述了這個大饑荒慘況。楊繼繩還告訴人們這麼一個史實：他曾採訪了當年在公安部負責人口統計的王維志及其當時擔任糧食部副部長的周伯萍。周伯萍老人對他說，1961年，糧食部陳國棟、周伯萍和國家統計局賈啟允三人受命，讓各省填寫了一個有關糧食和人口變動的統計表。經匯總後，全國人口減少了幾千萬。這份材料只送毛澤東與周恩來兩個人。周恩來看到後即通知周伯萍，立即銷毀，不得外傳！於是周伯萍等三人共同監督銷毀了材料及印刷版。事後周恩來還打電話追問，周伯萍回答銷毀了，周恩來

這才放心。

我們還知道這麼一件史實。1962年7月，劉少奇與毛澤東在中南海游泳池畔發生了一個著名的爭論。一向對毛非常恭順的副主席，這次居然“有些動感情”地頂撞了，憤然作色回應：“餓死這麼多人，歷史要寫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書的！”

毛澤東向來草菅人命。1957年11月，他率中共代表團訪問蘇聯參加共產黨和工人黨國際會議，就說過：“核戰爭有什麼了不起，全世界二十七億人，死一半還剩一半，中國六億人，死一半還剩三億，我怕誰去。”這就是他對人類生命的看法。正是由於毛澤東及其追隨者長期以來的刻意隱瞞，中國這場人類歷史上罕見的大災難至今沒有官方完整的正式記載和合理解釋，沒有被教科書承認，基本上處於遮罩中。對於今天許多中國年輕人，這場大饑荒的歷史有如天方夜譚。

然而，中國人敬畏歷史，歷史就在眼前流過，不會無動於衷。

楊繼繩是其中一位。他在大著的前言中說，其書取名“墓碑”，一是為他那1959年餓死的父親立墓碑；二是為三千六百萬餓死的中國人立墓碑；三是為造成大饑荒的制度立下一個墓碑；四是如果因為寫此書而遭至不測，也算是為自己立個墓碑。

趙旭，這部《反右運動



澳華著名畫家王旭和他的作品《永不忘記》。

夾邊溝慘案倖存者證言》的作者，是又一個勇於追求歷史真相的可敬者。他的《證言》，以倖存者證言集中暴露和剖析夾邊溝慘案這一個駭人聽聞的典型，也給我們留下了寶貴的歷史資料，成為研究中國為什麼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初那三年裡餓死幾千萬人的有力證據。發生在中國的那場大饑荒，是人類歷史上罕見的慘絕人寰的大悲劇。趙旭《證言》和楊繼繩《墓碑》相得益彰，為“中國大饑荒”的餓殍冤魂立起了沉重的墓碑。（未完）

何與懷



吃牛排

張仲衡

我小時候有經常聽爸爸說起吃牛排。他說當年經常和媽媽去“青島咖啡”吃牛排，“青島咖啡”是青島飯店的前身，民國時期的名字。我看著爸爸的嘴聽他講那牛排如何嫩，如何鮮美，那澆的汁是如何地道，還有配的雞茸玉米湯如何有味，好像看到了正宰割鮮美的牛肉。這在我天天餓肚子的懵懂少年無疑誘發了無限幻想。那時我們生活在山東省泰沂山區機窮困的一個小山溝的破廟裡，那個廟叫上汪寺。廟的三面是荒涼的墳場，前面一條小路通往數裡外最近的一個村莊。那時家裡太窮了，只有媽媽在這個破廟改成的學校做老師，爸爸因被打成極右派關進監獄四年半，刑滿也不釋放，轉去了廣北一個勞改場，他藉口有病逃了出來，就沒回去，但也沒有了身份，沒有工作。我正是個半大小

子，正事不知道，只知道肚子餓。夏秋時節我餓的受不了就去墳場外面的農田裡挖地，尋找農作物收割後偶然殘餘的可吃的東西。當地人稱之為“搵”。如搵花生，搵地瓜。更早些年代的時候，農民收割莊稼時總會有意無意留下少量的作物，是為更窮困的人去尋找以充腹，這是一個體現人性的傳統。可是到了六十年代，這樣的機會已微乎其微了，收完莊稼交完公糧，村裡農民家裡的糧食就所剩無幾了，於是大家蜂擁而至回到農田裡，挖地三尺地翻找任何可吃的東西。

稍微大一點了，我也懂點事了，我想我爸爸真行，看我們餓了就用吃牛排這一招畫個大餅讓我們忘了肚皮裡的事。實在蒙混不過去了爸爸還有一招，就是用筷子敲碗瓢盆，常常晚飯後即開始這打擊樂，有時爸

爸還跳幾下踢踏舞，吃不飽就用窮樂呵來彌補。反正那破廟周圍除了遊蕩的鬼魂沒有任何活人鄰居，或許僥倖的是那些早期的鬼魂不是餓死的，他們可能挺可憐我們的，從來不打擾我們。而六十年代那批餓死的都沒資格入土為安，魂都不知去哪裡了，按當地人講“托生”，就是轉世的意思。我想那些後來的餓死者肯定不再想在本地托生，而是飛的遠遠的，或者飛去大洋彼岸去托生了吧。無論如何，鬼魂沒干擾我們，連晚上在四周轉來轉去的餓狼也沒怎麼樣我們。其實在那個年代真正讓我們恐懼的不外乎是人。

1968年春節，年三十晚上，家裡只有我和媽媽兩人。我們是1965年8月15被發送到上汪寺，67年時爸爸逃亡在外，逃亡的原因是有好心人告訴爸爸第二天有批鬥大會，可能會出人命的，他勸爸爸外出躲避一段時間。爸爸

不在媽媽被批鬥無法照顧我們弟兄姊妹幾個，哥哥弟弟和妹妹送回青島讓外婆和奶奶們照顧，我從小皮實，就在當地一個農民的家裡住。過年時我回上汪寺和媽媽一起。話說那年的年夜飯只有大半碗煮蘿蔔絲，還有幾個我從農民家裡帶來的煎餅。昏暗燈光，天氣特別冷，爐子一熄火，房間裡的水很快會結冰。那天晚上媽媽幾乎沒說話，看著那碗蘿蔔絲遲遲沒有動筷，我知道媽媽的痛苦，我已十幾歲了，但我也不知說什麼好。我忽然想起爸爸的“吃牛排”。我強作快樂地問媽媽：“爸爸一直說牛排，那牛排到底是什麼味道？”媽媽的神態從傷感，凝重，微微抖動了一下。好像有一個什麼東西進入到媽媽的心裡，平緩了下來。媽媽為晚餐做了禱告。那天晚上媽媽不但講了牛排，還講了很多很多我不知道的家裡的往事。

七十年代，我在當地一個公社農具廠工作。這個廠的前身是當地一個外號叫陳三砍的土匪頭子的兵工廠。雖然地處偏遠，那年頭有工作幹已很不錯了。開始的工資一個月只有¥16元兩年後升為¥18元了。物資貧乏精神生活也貧乏，我們茶餘飯後聊天的談資因為閉塞限制了想像沒什麼好聊，成年人三句話後就是黃段子。而我們小青年和女工們聊天其中很大內容還是脫離不了吃，個個吹牛吃的故事，我當然免不了空談一通吃牛排。那時經常掛在嘴邊的是赫魯雪夫的共產主義之說，當蘇聯人們問赫魯雪夫說共產主義就是“蘇聯人都能吃上土豆燒牛肉”，還有瓦西裡的臺詞“麵包會有的”。其實麵包對當地人來講就如同牛排對我一樣，別說滋味，麵包什麼樣也無從想像。有次我奶奶從青島來看我們，我千囑咐萬囑

咐一定帶麵包來。奶奶不負重托帶來半打法式的奶香麵包，我那真是叫開心啊。我帶了兩個去廠裡，那天少說有幾十人品嘗這兩個麵包。他們排著隊，每人分了一小揪揪，小心翼翼的一點一點的品嘗，除了異口同聲地說好吃，在他們的經驗裡沒有相應的形容來表達這麵包是如何好吃。我後來想想，就那花生米大小的一塊麵包能品嘗出什麼滋味呢。但最主要的是大家都見到了真正的麵包。這不但是我大肆炫耀了一次，一定不在少數的人回到村裡也會炫耀，他吃過麵包了，而且如何如何好吃。反正之後的幾個月裡，大家都開一個共同的玩笑，“共產主義就是奶油麵包”。其實我何嘗不是有一個願望，即這輩子能夠頓頓有奶油麵包，我就心滿意足了。我不知道是誰第一個道出“貧窮限制了想像”，這話說的太有理了。（未完）